

【区域协调发展】

论新发展格局的空间向度^{*}

刘美平

摘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对当下世界变局所做出的顶层设计,需要站在战略高度解读其空间价值。传统的城乡分工、区域分工乃至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都是在平面视角审视发展空间的分析路径,而今以高科技航天产业为主导的、具有独特防卫价值的太空空间已经成为新发展格局中的崭新立体空间载体。从太空空间俯视地球海陆空一体化这一可视空间,发现宇观视阈下的太空空间与宏观视阈下的陆海空地球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而连接这两者的正是包含了网络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网络空间。至此,太空空间、地球空间和网络空间成为新发展格局中三大空间的延展向度。

关键词:宇观;太空空间;网络空间;地球空间;区域分工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1-0028-11 **收稿日期:**2021-09-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式研究”(21FKSB019)。

作者简介:刘美平,女,经济学博士,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 201306)。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快了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势。在此情况下,各个国家都在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未来如何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中国也不例外,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中国的应对之策。新发展格局是以内循环为主体、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框架,但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内循环与双循环的范围到底定位在哪里?以往的城乡分工、城市之间的分工、国际区域分工、陆海空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否就是新发展格局空间的全部内容?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发展格局需要新空间来承载。进入21世纪以来,从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来看,人类文明脚步所到之处已经不仅仅是地球区域内陆海空这一可视、可及空间,还包括了地球之外的星球空间,也就是

太空这一人类正在探索的新空间。人类之所以要探究太空空间,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地球空间的安全、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都由太空空间技术来掌控和决定,并且太空空间经济与地球区域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空地一体化的空间系统。在地球空间与太空空间之间,现代通信科技将这二者联系起来,而连接两者的正是大家所熟知的网络空间。地球空间范围内的陆海空自成一体,地球之外的广阔宇宙成为人类想要了解的新空间,网络空间把陆海空系统空间世界与太空空间世界连接在一起。至此,地球区域空间、太空空间、网络空间成为新发展格局的三大空间,构成了宇观视阈下新发展格局的空间系统。

新发展格局中的新空间容纳新产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新发展格局是具有崭新内容的格局,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格局,是容纳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格局,是吸引国内外资本的格局,而承载这些新旧产业与所有资本运动的空间

正是地球区域空间、太空空间和网络空间。产业连同其形影不离的资本在突破原有空间的同时,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空间,由此形成新发展格局。也即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资本链进行产业循环与资本循环有了更广阔的延展空间,这些不同空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运动变化规律构成新发展格局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陆地区域分工的平面解析

陆地区域分工是微观、中观、宏观视角下研究发展的向度。如果从空中俯视地球,陆地就如同浸润在海洋中的一个岛屿,海洋就是包容多个陆地的容器。陆地自身的块状分工首先是自然景观上的分工,山脉、河流、平原、盆地、丘陵这些都是相对独立的自然物质存在。当人类活动在陆地上出现袅袅炊烟的时候,村庄、城市、城市带、城市群相继出现,国家、次区域联合体、区域一体化、全球化这些都是人为作用下的陆地区域分工的结果。陆地区域分工既是陆海空三维分工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分工的空间存在,还是相互关联的社会生产体系受一定利益机制支配的情况下在地理空间上发生的分异。这种分异形式又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分工、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工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等,其中,城乡分工是区域分工的微观形态,建立在城乡分工基础上的区域分工是陆地分工的中观表现,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陆地分工的宏观形态。

1. 新发展格局中的城乡分工

城市和乡村是陆地平面新发展格局的落脚点。从地域与功能特征角度出发,城市与乡村的概念是不同的。国内经常提到“城镇”一词,这里所说的“城镇”是指城市型建制镇,通常可与城市的含义互换。此外,市与镇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行政规划上,虽然二者在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方面会有明显的差别,但这些差别对于中国的“二元经济”分析没有大的影响,并且城市中包含市、镇,因而可以把和乡村内涵不同的对象称为城镇。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新乡村、新城市。

城市的纵深发展是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城市的形成与生产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城市是伴随着社会大分工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石器时代,农、牧业的分离使得从事农耕的人渐渐定居在土地

上,开始出现村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又促使市场的出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产品流通日益频繁,手工业发展和商业进步所带来的集聚人口使城市繁荣起来,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产品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多,人们为了节省贸易成本,会根据贸易对象的不同来分层安排贸易活动,而贸易活动的分层结构又会导致城市的分化与分层。从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工业化的深度发展和城市化的能级提升更大程度是通过城市来体现的,因而,城市的适度规模成长和发展层次跃升就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

新发展格局就要在不同类型城市成长中弥补其存在的缺憾。单中心结构、多中心结构和网络型结构是城市分化分层后的结构类型。单中心结构是各国城市的早期扩建形式,该布局的特点是要素分布集中、布局紧凑,可以节约用地,便于发展公共交通、缩短通勤距离和成本,有利于城市的快速起步和发展。单中心结构的缺点在于:只适合于中小规模的城市或城市的最初发展时期,当城市规模较大时,拥挤问题将会非常突出。多中心结构城市正是为了解决单中心城市的交通拥堵、污染及地价上涨等问题才诞生的,多中心结构城市可以实现追求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的目的,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容纳更多、更复杂、更高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化结构则是城市在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情况下的必然结果,是超大城市结构演化的新形式,是后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存在状态。

乡村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镇相比,乡村人口分布较为分散,且以农业人口为主。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偏远地区以传统型乡村经济为主,传统乡村经济因技术和生产效率较低、生产经营较为分散,难以出现较大规模的专业化经营,也较难形成大规模的市场。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较为重视城市规模的扩张,很少把注意力集中到乡村。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要畅通城市市场,更要扩大和提升乡村市场;不仅要促进城市消费,更要重视乡村消费,并且不断满足乡村人民的消费新期待;不仅要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更要增加乡村居民的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劳务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收入支撑的消费

市场,才能盘活乡村内循环的微观基础,才能实现城市循环、乡村循环以及城乡循环的一体化,从而把城市化深入到乡村深处,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切入口。当然,城市化的推进也会遇到新问题,即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不断扩张,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这将造成乡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而相对应地出现土地过剩、农业容量过剩、经济发展空间过剩。于是,新发展格局就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的关键。

2.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

现代化初期的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增多、农业弱势产业中低下劳动生产力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明显特征。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原因,法国经济学家用“增长极”来解释二元结构,认为“增长极”恰似一个“磁场极”,不仅吸引大量的经济活动,同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缪尔达尔用累积因果理论解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赫希曼用“涓滴效应”理论来解释美国南北地区差距所造成的二元结构的起因。当然,最著名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由刘易斯(1954)提出的两部门理论。刘易斯认为,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现代城市部门会自动吸收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的一元化。但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像刘易斯模型所阐述的那样的经济结果。以中国为例,刘易斯模型既无法恰当地解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特殊性,也不能作为彻底化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指导性理论。这既说明刘易斯模型本身就具有理论的局限性,又说明不是所有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都能通过同样的途径实现一元化。

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从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统筹城乡发展。应该注意的是,不能混淆城乡差别与城乡差距,无论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城乡差别都会存在,是城乡不同生态景观、不同产业内容和不同文化内涵的总称。城乡差距则是源于城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差和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能级的差距,是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繁荣与凋敝的对比。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下提升乡村经济发展能力,提升乡村服务水平

均质化方面做文章,在城乡市场循环、城乡产业循环、城乡资本循环、城乡人才互动方面有所作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能级、提高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双向高效循环的过程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从城乡二元结构朝着城乡一元结构演变的过程,就是逐渐缩小城乡差距的过程。

以小康社会引领乡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小康社会建设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连片区域性贫困的整体脱贫和农村个别地区的精准扶贫阶段;二是乡村整体的物质丰富和文化繁荣阶段。“十三五”时期,在党中央的总体部署下,在大量一线扶贫干部的积极奋斗努力下,通过全国贫困地区农民的勤奋劳动,通过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电子商务扶贫等多种方式的精准脱贫,中国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性胜利,基本上消除了绝对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老解放区的连片区域性贫困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成为扶贫的首要内容,以“两不愁”“三保障”为基准点,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新时代的新农村正在向物质富裕和文化繁荣阶段迈进。

3. 新发展格局推动城市集群化

新发展格局需要城市品质提升和城市结构创新。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是以单个城市的发展为主要内容,区域内单个城市的点式成长构成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方式。当城市化进入到中期阶段乃至后期阶段时,随着单个城市品质的提升,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日渐紧密,城市结构与城市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城市带或城市群就是这种质变的具体表现。城市作为区域经济集聚中心,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就是城市带(或城市群)。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由联系密切的数个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现代交通运输网以及信息网络,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所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就是要在提升单个城市品质上下功夫,就是要形成城市中的特定产业和城市特质

文化。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城市精神的文化区别构成新发展格局的城市内涵,集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于一体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则是新发展格局中群体城市规模经济增长的集中体现。

新发展格局的竞争就是城市群或城市带的竞争。20世纪50年代,简·戈特曼提出了城市带(或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是发达国家产业布局的高级形态,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成熟集聚状态,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客观反映,城市群的整体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例如,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巴西南部沿海城市群和意大利北郊波河平原城市群就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中国也已经初步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但是中国的城市群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群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市带是“区带”范式下的规模存在,城市带大多是以一定长度、一定宽度、一定面积范围内多数城市为依托的城市带状分布结构。

中国城市群与城市带的纵横交错、功能分工是新发展格局的顶层设计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是城市群或城市带的差距,就是区域分工、城市分工和产业分工中形成的结构差距。长江经济带、黄河生态经济带是新发展格局中以中国两大母亲河为纽带的城市带总体布局;以雄安新区引领的京津冀城市群,以上海引领的长三角城市群和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支撑的哈—长—沈城市群是新发展格局中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布局;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以成渝为主体的中西部城市群作为中国制造业基地实体经济的重镇,形成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生产中心和多式联运物流中心。新发展格局赋予城市带和城市群不同的功能定位:两大城市带不仅有经济发展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还有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这也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稳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文脉。六大城市群产业分工的差异化、区域分工的特色化、不同城市群之间协同合作的一体化,共同形成了城市群整体辐射和多点波及效应。

新发展格局就要通过布局已有城市群或者城市带畅通城市循环系统。现阶段,中国不同城市之

间的内在联系存在着行政区划藩篱,存在着市场分割问题,存在着循环阻滞现象,所有这些是影响新发展格局建构的负面因素。为此,要深入建构城市群经济联动机制,把城市之间的行政区划和城市群经济运行一体化协同起来,使格式化的行政区划管理服从于城市群整体区域的一体化建设。城市群之间的循环畅通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要在区域内形成城市群一体化的协同行政管理机制;另一方面要在城市群之间建立起联动分工协作制度,使城市群既能独立运转与循环,又能与其他城市群协同运转、步调一致,从而实现大循环与微循环畅通无阻。

新发展格局是着眼于国家战略安全的整体区域布局。从区域安全角度讲,促进城市群的合理布局和健康成长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产业安全角度来讲,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核心技术和形成高端产业是中国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目前,国内城市群有趋于成熟的城市群,也有处于成长期的城市群,还有正在形成的城市群。对于较成熟的城市群,应该在核心技术和高端产业群方面有所作为,在光刻机的研制与量产,包括核磁共振仪、CT、超大型X光机、质谱仪、冷冻电镜等在内的科学仪器研发领域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对于处在成长期的城市群,虽然已经有属于自身的特色产业集群,但国际竞争力欠缺,因而要首先明确战略产业,然后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和体制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创新,而不应该把精力、财力、物力和人力都用在平台经济、游戏开发、房地产业等领域等科技含金量低的产业方面。对于已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的东北城市群,要加速形成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推动以飞机发动机研发为代表的航母制造、飞机制造、核潜艇制造等事关国家安全的高科技军工产业尽快形成国际品牌。

三、太空空间的立体仰视

曾经,太空空间对人类来说属于陌生空间,时至今日,人类对太空的了解和认识也仅仅是冰山一角。人类探索太空空间的最初动力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苏争霸。1954年,全球科学探险计划大会召开,美苏在太空领域的竞争拉开序幕,这也是人类探索太空奥秘的开始。太空空间是否具

有研究的价值?人类进军太空空间要解决人类的什么问题?人类在太空能够发展什么产业?人类征服太空意味着什么?对这一系列问题答案的探寻构成了人类探索太空的最初动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太空空间是人类发现的宇观视阈下的新发展空间。

1. 太空空间的美苏争霸

月球是美苏在太空展开争霸的最初领域。人类要发射卫星到太空,想从太空环视地球,从而了解地球的真面目,为此,苏联和美国各自成立了宇航局,还制定了宇航计划。为了更早地实现对太空的霸权,美国还在美国宇航局管辖之下成立了克罗威尔公司,专门进行国家意义和商业意义上的宇宙航空探险活动。面对太空这个崭新的空间,苏联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探索欲望,并在赫鲁晓夫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宇航计划。

卫星是美苏争霸太空的关键。人造卫星分为技术卫星、通信卫星、科学卫星、侦察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等,人类最开始向太空发射的并不是卫星,而是月球探测器,从发射不载人月球探测器到载人月球探测器再到地球轨道卫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958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奠定了苏联在全世界宇航领域的领先地位。1966年,当苏联宇航顶级专家克罗列夫突然逝世之后,苏联的航空工业发展日渐落后。1958—1966年,美国在太空探险计划实施方面总是接连失败,这让当时作为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以及美国航天界感到忧心忡忡,直到克罗列夫突然逝世之后,美国才实现了后来者居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逐渐在太空竞争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逐渐确立了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霸权地位。

太空空间的安全防卫价值是美苏抢占太空空间的关键原因。太空战、导航战、星球大战都是源自太空的战争威胁,太空的防御功能显而易见。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导航战的国家,此后出现的基于空间攻防的战略装备与技术竞赛在国际间悄然开始。显然,世界上谁掌握了太空主动权,谁就拥有了来自宇宙空间的全方位安全,美国为此将美国航天局改为美国航空航天局,还组建了航空航天军事力量。在此基础上,美国还成功研制了以GPS为代表的一系列航天先进科技,GPS的诞生是太空空间军事防御价值和通信产业垄断价值的集中体现。

从太空安全角度来讲,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发射卫星,而另一个国家能够反制他国的卫星,则这种发射卫星能力与反制卫星能力之间的斗争将不断持续。于是,美国的太空交通管制如期而至。

2. 太空空间的新产业

太空的产业价值超乎人的想象。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经济、在线经济、网络经济等都离不开太空空间技术的贡献,美国太空基金会战略传播和拓展部副总裁库珀提道,我们在地球上所做的一切都与上面发生的事情直接相关。无论是手机,还是数据,无论是先进的医疗技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与这一点有关,而这正成为全球空间经济的一个更大的组成部分,它正在创造就业机会,并创造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留给火箭科学家和宇航员的机会。没有了气象卫星,天气预报不能准确预报,智能农业不能快速发展;没有了资源卫星,人类对月球、地球、火星资源的探测就要在黑暗中摸索;没有通信卫星,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服务、准确定位等就寸步难行。这说明,太空空间与陆地空间的技术联系和产业联系十分紧密。

一个国家太空通信产业的科技先进程度决定了其国际地位。曾经,中国的安全防卫和航空经济依赖并受制于美国GPS导航定位系统,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并且顺利开通,中国摆脱了美国的太空霸权,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中和平利用太空空间资源的序幕正式拉开。此外,太空空间的经济价值还包括能源产业价值、资源价值和生物产业价值,太空资源开发与利用是世界大国博弈的新空间,这些资源既承载着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也是地球上主权国家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太空资源的勘探、开发、运输、利用等成为太空空间区域经济的崭新产业链。倪红福和夏杰长等相关研究也表明,世界产品的价值链主要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为核心,其中就包括太空产业资源开发与利用形成的产业链。就生物价值而言,太空育种可以解决地球育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拓宽生物物种范围、改变生物基因特性,这些已经成为高科技生物制药产业、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新内容。

3. 太空空间的安全治理

未来,太空的空间存在与人类的共同命运息息相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世界各国的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应对疫情的需要,也是对未来发展前途的预判。人类的未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命运与共,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守望相助方能共渡难关。病毒不分种族,疫情跨越国界,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人类必须联合起来,联防联控,团结一致,才能战胜新冠病毒对人类的侵害。正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线上视频会议才在全世界逐步流行,网络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迅猛发展,而这些都离不开通信卫星的技术支持。依托于太空空间的通信产业成为人类抗击疫情、团结合作、命运与共的技术保障。

太空的空间治理与全球安全息息相关。在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太空空间的重要性和战略性,太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经济竞争空间,更是需要治理的政治空间和军事安全空间,太空安全治理问题逐渐显现。中国的太空安全如何保障,国际社会在太空治理方面的规则如何确定,将成为下一步世界各国博弈的又一个目标,一场事关未来人类命运发展的太空治理权争夺战已经打响。太空空间治理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广泛参与,而要想参与到太空空间治理的行列,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太空空间技术与产业,否则,就没有太空空间治理发言权。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不断地拼搏奋进,中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不仅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还在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航天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标志性成果,拥有了太空空间治理的发言权。美国的SpaceX公司和毕格罗太空科技公司是从事太空空间商业开发的著名公司,根据2014年美国宇航局和俄罗斯宇航局达成的协议,从1998年开始建设的国际空间站运营时间将会至少持续到2024年。鉴于此,太空空间治理要在国际空间站的设立与管理、太空空间开发秩序的建立、太空产业研发的安全考量等方面建立一系列治理制度,而正是由于太空空间治理的规则和治理结果事关人类未来命运,因此必须给予太空空间治理以高度重视。

四、地球空间分工的发展维度

地球空间是宇宙关怀人类的栖息地,地球上的阳光、水、土壤是地球空间哺育人类的三大重要物

质,但这种哺育不是地球空间孤立状态下才具有的,而是在太阳系这一普遍联系中获得的。而研究发现,对地球及其地球空间的存在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整体分析。

1. 地球空间的整体环顾

地球引力的存在是地球同其他星球普遍联系的结果,在宇宙普遍联系中体现了地球与其他星球之间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辩证法。新发展格局源于地球,但又不能仅仅从地球自身考虑,而是要从高于地球的站位审视地球存在的整体意义。地球与月球之间的空间引力让地球上的一切发展格局都得以展现。现如今,太空军事装备能力决定一国的总体安全水平,一国的太空勘探技术决定一个国家对太空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所有这些探测太空的技术都来自于地球陆地空间的高科技,即一个国家拥有的太空技术越发达,该国家在地球上的生存空间就越广阔。

值得重视的是,不同国家掌握的太空制空权会有所不同。拥有太空制空权的国家会首先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太空治理秩序,太空正义程度会因为不同太空治理规则而不同。地球空间分工中哪个国家掌握最先进的太空空间技术,那这个国家就拥有制定太空治理规则的权利,而参与治理国家的公平正义程度是决定太空探测水平以及探测结果正义与否的关键因素。

2. 空地一体化系统空间透视

空地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空间价值演变与立体格局分工的结果。如果将空间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视作具有内在联系的学科,或者将空间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看成是同一个学科,那么空天一体化与空地一体化就是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共同研究的对象,也是区域分工或空间分工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空天一体化还是空地一体化,最初都是军事领域的术语。空地一体化信息战是新时代战争的新形式,信息对抗、信息干扰、信息搜集等都是空地一体化信息战的主要内容。这里的空天一体化是指太空和临空的一体化;而空地一体化是指地球与临空的空间分工,“地”是指地球上陆地与海洋组成的整体,而不是仅仅指陆地,这里的“空”是指临空而不是太空。

空地一体化是将平面结构的海陆一体化升级为立体结构的海陆空系统一体化。在人类没有出

现在地球上之前,空间是原生态的,原生态空间是无价值的。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后,空间变为次生态空间,次生态空间是有价值的,即使是原始人也有下意识地占据和拓展生存空间的意愿与行为。当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之后,空间变为衍生态空间,当资本充斥在这些空间的时候,衍生态空间是高价值的,人类对空间的占有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乡村与城市、陆地与海洋、近地与临空,所有这些是人类占有的衍生态生存空间,海陆空三维立体空间开始形成。

临空视域下区域分工是新发展格局的逻辑起点。临空是连结时间与空间并成功将时空凝结在一起的存在形式。临空空间具有无限性、均质性特点:无限性是相对于有限区域而言的,但对于特定的行政区域而言,临空空间又是有限的,各个国家的领空就是无限空间与有限空间的结合体。临空空间是均质的,更进一步讲,是指原生态临空空间具有均质性,当不同国家的领空有了属于自己国家特有的临空区域的时候,临空空间会因为临空产业的发展程度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例如,因为临空旅游开发、空军军事训练、空中运输等产业的不同,临空空间的非均质性就表现出来。无论是哪一种改变临空存在形式的人类活动都是在空间领域的时间累积,没有融入时间因素的临空空间是不存在的。认识到这一点,就认识到临空秩序的确立、临空经济效率的提升和临空活动范围的扩大都是占有空间和延续时间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

空地一体化使得海洋航运、陆地运输与空中交通实现无缝对接。海陆空多式联运就是这种空地一体化分工合作的整体设计和有效实施的结果。人们在探索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选择运输方式的时候,从最开始的人力改变物体空间位置,到后来运用机械改变物体空间位置,再到运用专门的交通工具改变商品交易集聚地,经历了交通工具变革的漫长历程。在这个漫长历程中,区域性可视空间不断变换,最开始仅仅是在陆地或者海洋的近海附近发展交通和运输,而后是成功探索了以飞机为重要运输工具的空中物流。因此,以交通和物流为媒介的海陆空区域空间紧凑式无缝对接是后工业化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在新格局框架下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根本性变革。

临空区域经济是空港辐射范围内的自由贸易

集聚地。临空区域经济绝不是建设一个机场,也不是简单地实现空中客运与货运。机场只是作为发展临空经济的必备基础设施而存在,其内部建构与外部扩张才是临空经济的增长方式。内部建构表现为临空区域内的产业集聚区、出口加工区、转口贸易区等建设;外部扩张表现为航线的开辟和陆海空交通物流的时空对接。这样的时空对接一方面具有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空间价值。如果没有国际国内贸易,临空区域经济的存在意义就不会如此突出。临空区域范围内的产业集聚区、出口加工区等是服务于国际贸易的空间选择,是将城市中国际贸易生产基地前移至空运基地的港、城融合过程,是基于减少区域经济发展治理成本和营运成本的做法,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意义上的工业化作为,是改善区域空间结构重构效应的重要举措。世界上虽然有不同的临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不同国家却有着临空经济的发展共性。

3.海陆融合发展的空间尺度

陆地空间的独立存在与海陆空间的融合存在是检验区域经济发展视野广阔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地球上的海洋和大陆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陆地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海洋则是人类陆地生产、生活的延伸区域。如果仅仅认为陆地经济就是国家经济全部的话,那么,海洋经济就会被排斥在外。若这种认识在一个国家的政府、学术界成为共识的时候,那该地区在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就会产生区域空间意义上的狭隘主义,由此产生的区域空间内陷式发展最终会导致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的日益萎缩。

海洋存在的经济意义不仅仅是人类获取资源的宝库,更为重要的是,海洋还是人类间接的生存空间和直接的发展源泉。美国早就把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后的开辟疆域”来看待,加拿大也已经在海洋产业方面进行提前谋划,日本更是梦想着要成为海洋大国,英国更是把海洋科技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在中国,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海洋强国这一战略目标,提出应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与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还提

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这是超越本国本位主义的海洋发展观,是对人类命运的海洋关怀。各个国家之所以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是因为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洋石油的勘探、开采、运输成为世界各国海洋产业中最大的“蛋糕”,海洋矿产品开采与利用成为海洋产业中的高科技产业,海洋生物医药更是把医药产业激烈竞争提升到新的高度。所有这些都说明,人类在远海、深海的空间区域经济活动才刚刚拉开序幕。鉴于此,无论是城市区域发展的整体规划,或是国家区域发展的战略规划,还是经济全球化视域下中国的新发展格局构建都离不开海陆一体化这个空间前提。

海洋与陆地生死与共的生态意义在新发展格局中举足轻重。无论是工业文明之前的人类社会,还是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社会,都产生了很多的污染,这些污染要么深埋在陆地之中,要么在进行物理、化学处理后流入大海。在陆地与海洋的联系之中,除海陆一体的交通运输联系外,海洋还吸纳了太多的人类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即使是进行了环保产业发展和污染治理,陆地上依然有大量的污染物流入海洋。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洋成为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最后一块生态栖息地。任何一个空间单位(国家或地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的经济水平和结构状况,都是以往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起点。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类对海洋这一空间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要从现在开始,海洋同陆地一样作为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空间,应该有属于新发展格局框架下的生态系统,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统筹陆海一体化的空间创新思想。

海陆各异的文化意义在新发展格局中精彩纷呈。海洋与陆地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两者还有各自的独特文化内涵——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也可以称之为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海洋与陆地都留下了人类文明的足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气质。广阔的海洋是开放、包容、宽广的文化象征,坚实的陆地有着沉稳、执着、刚毅的文化意象。海洋文明不只是西方独有,古老的东方早已有征服海洋的文明实践;陆地文明不是西方一直领先于东方,智慧的东方早已在陆地上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海洋文明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

是近代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但海洋文明由来已久;陆地文明也不等于落后文明,仅仅凭借阶段性重点就营造“海洋文明中心论”既是愚蠢的行径,也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把海洋文明、陆地文明区域化是零和博弈思维,把海洋文明、陆地文明对立化更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思想,把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并驾齐驱才是新发展格局应有的思想意蕴。

海洋空间是新发展格局中影响国家安危的重要载体。平时谈到的区域,其实都是和平年代、正常时期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区域,领水、领空、领地首先是军事意义上的主权空间,其次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如果一个国家想到其他主权国家范围内的空间进行航行、国际投资与经营的话,需要得到对方的准许,按照国际惯例、约定或者协议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可见,区域实质上都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海陆空管辖空间。如果说陆地上只有南极和北极是公共陆地的话,那么,海洋就不一样了,除各主权国家的领海外,还有公海,公海是各国都可以进行经济活动的海洋空间。当然,海洋区域空间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航运中的海洋空间具有巨大的赋能作用,海洋经济从属于海洋军事,海洋经济与海洋军事一起构成新发展格局中海洋空间的两大战略支点。

五、网络空间的安全要旨

人类的产业活动和区域经济活动从来没有离开过信息。刀耕火种的年代人类依靠简单的手势传递信息、表达意图;进入远古时代,随着人类的语言功能越来越发达,口口相传成为原始农业发展过程中进行信息交流与经验传递的主要方式;进入阶级社会,无论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维系,还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信息传递与信息交流。信息不仅在农业、手工业、工业、服务业中自由穿梭,信息还在不同阶层的经济主体中传递情感与命令。当信息在某一个地区形成固定表达方式和传递模式的时候,信息就变成文化渗透在特定区域,用以作为一个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参照系。由此可见,信息资源如同浸润在各个阶段社会形态中的水一样,作

为物质变化的产业和作为区域存在的空间都通过信息融合在一起,信息可谓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1.新发展格局中网络空间的虚拟客观存在

网络是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存在形式。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类就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跨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文明是人类技术演进过程中质的飞跃,从此,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空间——网络空间。如果说陆地空间和海洋空间都是可视空间的话,那么,网络空间则是不可视空间。必须指出的是,从后现代文明的信息科技角度来看,不可视空间的发展深度决定了可视空间的发展水平和层次,或者说,网络空间的信息化水平决定工业化的国际竞争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技术占据的网络空间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把握网络空间的存在特性。与陆地空间和海洋空间相比较,网络是具有捕获信息能力的虚拟空间。与地球空间和太空空间不同,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无限性、联结性和延展性。就虚拟性而言,网络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反应,以网络语言、网络技术为内容形成的网络社会同样既是虚无缥缈的,又是客观存在的。就无限性而言,网络空间打通了地球空间、海洋空间、太空空间的每一个角落,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网络世界一目了然,仿佛“一网打尽”所有内容。就联结性而言,网络空间只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才成为地球空间与太空空间的特殊联系通道,信息网络化是地球空间区域中个别国家在地球空间与太空空间建立联系方式过程中进行科技创新的结果。就延展性而言,网络不仅仅能够捕获信息,重要的是,网络技术还能在捕获信息的基础上加工信息、整理信息、传递信息,形成一系列信息产品和服务,于是以软件开发、智能制造为内容的网络信息服务产业应运而生,网络空间的崛起势不可挡,这就是捕获信息后的网络空间开始向地球空间与太空空间的延展态势。由此可见,正是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将所有其他可视空间融为一体,而将地球与太空两大空间一体化进行融合的这一强大介质正是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特殊地位独一无二。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刻理解网络空间的渗

透特质。网络空间可以渗透到任何一个空间,并能融合到这个空间,而融合其他可视空间只是网络空间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重塑被融合的空间。无论是陆地空间的城市与乡村,还是海洋空间的近海与远海,或是遥远的太空空间,网络空间都可以改变其存在状态。对于陆地空间而言,城市格局、乡村格局都会因为网络空间的重塑而变得经济繁荣和四通八达。对于海洋空间而言,新航线的开辟和航行方向的确定以及航运安全的确保更是离不开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保驾护航。就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自身而言,网络空间所到之处没有阻力,如果有阻力的话,也是人为的阻力,网络空间的无形渗透是以往任何可视空间都没有的特点,而高质量发展就孕育在这样的网络空间之中。网络空间还可以同农业技术、工业技术等进行兼容,这种兼容性就是信息化与现代化的兼容,而后现代化正是包容了网络空间和运用了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现代化。

2.新发展格局中网络空间的技术赋能

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一起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政府治理方式。从工业化的历史演进角度来看,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写了传统工业化引领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各个国家的生产方式角度来看,网络空间通过信息赋能实现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根本性变革。由网络设计、网络研发、无人车间、智能药房、智能超市、智能旅馆等智能化设备充斥的智能新社会如期而至,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智能服务等再生产链应运而生。网络空间虽然具有虚拟性,但构成网络空间的技术体系却是实实在在的: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以根服务器为依托、以海底光缆与陆地光缆铺设为新基础设施、以固定终端或移动终端为信息出口、以软件智能表现技术为载体的一整套物质技术存在形式所构成的,而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之上的物联网技术更是实现了物质世界的互联互通,建立在光纤技术之上的卫星通信还实现了网络空间与地球空间、太空空间的互联互通。这其中的每一项技术都不是虚拟的,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但就是在这些“有”之中却孕育出“无”的虚拟世界,又由“无”的虚拟世界衍生出“有”的网络空间多彩世界,这正体现了老子“有就是无”“无中生有”的哲学理念。

网络空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交方

式。自从有了网络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导航,可以随时随地点外卖,可以预约出行专车,可以运用支付宝或微信进行购物付款,可以网上购物,可以进行生活缴费,可以观看电影、搞笑视频等,所有这些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赋能于互联网空间之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除此之外,人们的社交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网聊”代替了真实的聊天,网友成为朋友的重要组成部分,“朋友圈”这一虚拟朋友群体成为每个智能手机的标配,社会进入了崭新的自媒体时代,而自媒体时代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信息的接收者和信息的传播者。

网络空间成为政府治理的新空间。如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交方式一样,互联网同样改变着政府服务方式和服务路径。政府可以利用网络让信息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这是政府提高效率的有效措施。政府根据民意制定符合民意的政策体系和治理制度,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最集中体现。以上海为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作为超大城市的典型代表,上海就创新了政府治理的新方式——“一网通办”和“一网通管”,把所有居民和企业需要办理的事务整合到信息高速公路上,在信息化社会打造了上海超大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十四五”时期,上海在政府治理方面还应进一步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治理绩效,实现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使得超大现代化城市社会治理更上一层楼,让信息化社会服务和政务办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施。

3.新发展格局中的网络空间安全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空间安全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民族生存、国家命运和执政安全。以往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尽管也是事关全局和国家发展的安全领域,但是自从互联网出现以后,网络信息安全就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与关键。与常规战争相比较,网络攻击非同一般,可以实现精准打击,直接击中目标国家的政治、军事、国防、经济贸易往来等关键基地和信息源,从而给目标国家带来严重冲击。鉴于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新发展格局要兼顾发展与安全,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特别要重视网络信息安全。

网络空间安全事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

和执政安全。就政治斗争而言,意识形态在网络世界是国际社会的隐形战场,网络话语权成为垄断舆论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强利器。由于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最先由美国研制成功,因而美国拥有了网络空间的最强掌控权,网络意识形态也就成为美国颠覆其他国家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的锐利武器。美国利用网络传播途径,把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理论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中国,这些反动的思潮和理论成为和平演变中国政权颜色的文化斗争方式,并通过西化、自由化、私有化、腐化等卑劣手段达到瓦解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政权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掌握网络空间战场的主动权、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掌握国家政权和主权,以此来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基本制度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网络信息安全需要正义的虚拟空间治理为其提供保障。信息技术水平的高低与信息传递方式的不同成为区别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网络空间的强大性表现为在信息区域性垄断和全球传播之间达到收放自如的境界,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技术都无法比拟的。自从网络空间出现以来,网络空间治理就如影随形,但虚拟网络空间由谁来治理?又如何治理?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虚拟网络空间的公平正义和道德伦理也因此而备受关注。美国的霸权从军事领域到金融领域,从政治领域到文化领域,从实体经济领域到虚拟网络空间领域,全球网络治理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又一个权力内容。与其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不如说是美国对目标国家或区域实施信息化区域性垄断。美国控制全球虚拟网络空间的抓手就是互联网技术、根服务器和GPS导航系统,这些网络技术的分配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这让美国既可以控制虚拟网络空间中充斥的每一条信息源的传播内容,还可以对选定区域进行网络空间打击,前者表现为网络话语权,后者表现为网络暴力权。而正是由于围绕着网络话语权和网络控制权展开的国际治理斗争此起彼伏,因此,新发展格局下旨在消除网络暴力和网络霸权的正义网络空间治理才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 [1]杨开忠.中国区域发展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
- [2]朱舜.行政区域经济结构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 [3]安虎森.新区域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 [4]顾朝林.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1(5).
- [5]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J].经济研究,2019(7).
- [6]盛朝迅.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J].改革,2021(2).
- [7]陈晓东.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若干重大问题[J].区域经济评论,2021(4).
- [8]兰玲,程恩富.构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7).
- [9]刘秀,赵东兴,徐卫卫.国外空间攻防对抗装备与技术发展分析[J].国防科技工业,2020(7).
- [10]张克非,李怀展,汪云甲,等.太空采矿发展现状、机遇和挑战[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20(5).
- [11]倪红福,夏杰长.中国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其变化[J].财贸经济,2016(10).
- [12]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13]何奇松.太空武器化及中国太空安全构建[J].国际安全研究,2020(1).
- [14]何奇松,南琳.太空安全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15]罗国荣,车勋,贾志勇,等.空地一体化信息对抗系统构架设想[J].航天电子对抗,2017(2).
- [16]荣朝和.交通—物流时间价值及其在经济时空分析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2011(8).
- [17]汤凯.临空经济对区域发展的重构效应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7).
- [18]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N].人民日报,2013-08-01.
- [19]蔡昉.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8(1).
- [20]刘美平.“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海陆统筹文明观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9(6).
- [21]周建青.“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困境与路径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8(9).
- [22]周宏仁.网络空间的崛起与战略稳定[J].国际展望,2019(3).
- [23]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
- [24]陶希东.“十四五”时期上海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经验、问题与思路[J].科学发展,2020(5).
- [25]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8.
- [26]阎学通,徐舟.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J].国际政治科学,2021(1).
- [27]张耀.网络空间安全视阈下的制网权释义[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8(2).
- [28]刘杨钺.网络空间国际冲突与战略稳定性[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4).

Study on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Liu Meiping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clear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hina in the key period of the century change of the world pattern. We need to interpret its spatial dimension from a strategic height. The traditional urban-rural division of labor,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are the analysis path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space from a plane perspective. Now the space with high-tech aerospace industry as the content and unique defense value has become a new three-dimensional space carrier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Looking down at the earth from the space, the visible space of Shanghai land and air integr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n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mology and the land, sea and ai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cosm, and it is the network space containing network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that connects the two. So far, space, earth space and cyberspace have become the three major spatial extension dimension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Cosmoscopic; Cosmological Space; Cyberspace; Earth Spac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责任编辑:齐 双)